

#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与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

代红娟,赵文龙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基于城乡双重空间分析框架,采用 2014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探究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在表征城市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这四个维度上,前三个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反映故乡眷恋的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却有负向显著影响,耕地的影响不显著;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现张力效应,城市经济适应水平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家人留守的负向影响并不受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因此,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水平、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和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农村流动人口;城乡双重空间;故乡眷恋;城市适应;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C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0)02-0109-09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0.02.013

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随着代际的继替,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自 2015 年始由持续上升转变为缓慢下降<sup>[1]</sup>,这种变化或已释放出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的信号。作为联结城乡二元社会的纽带,农村流动人口面临现代性和乡土性的冲突与调适,独特的乡城流动是其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影响自身及其家庭的主观福祉。

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普遍偏低,表现出与欧美社会不同的流动规律<sup>[2]</sup>。李强认为,户籍制度及产生的心理惯性使得“推拉理论”在中国发生了变形<sup>[3]</sup>。一方面城市社会“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权”<sup>[4]</sup>的制度推力长期存在,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乡土文化和现实利益形成的回流拉力客观存在。从家庭单位视角来看,农村人口流动难以实现家庭化迁移,收入的增加以牺牲家庭幸福为代价<sup>[5]</sup>,且城乡流动中挟裹的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冲突容易衍生“农村再适应”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滑向“城市留不住”与“农村回不去”的社会边缘。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他们与城乡社会的双重断裂,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sup>[6]</sup>。因此,平衡农村流动人口城乡双重空间流动中的生活体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意义。

已有关于提高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方面的研究更多关注城市因素<sup>[7-8]</sup>,少有研究将城乡因素置于统一框架。实际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受制于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共同作用,乡土性与现代性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两个面向<sup>[9]</sup>,二者的内在张力使其生活世界愈加复杂。本文从城乡双重空间透视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世界,探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以期对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的 subjective 评价,与幸福感共同构成衡量主观

收稿日期:2019-10-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扩大利益交汇点与凝聚社会共识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信任构建”(14ASH001)。

作者简介:代红娟(1987-),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心态。

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生活满意度偏向于认知维度,幸福感侧重于情感维度,实证研究中常将二者交互使用。国内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以 1980 年出生为界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sup>[10]</sup>,这与改革开放的时间吻合,反映了宏观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境遇的影响。与非流动人口类似,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受个体特征、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及社会公平等因素的影响<sup>[11]</sup>。除此之外,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还受迁徙行为的影响<sup>[12]</sup>。

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行为存在动因上的共性与时间上的差异。近代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较早发生在欧美社会,“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之一,它将迁移行为归因于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流入地存在改善生活条件的拉力因素,流出地存在不利社会经济条件的推力因素,且两地都有推拉力。具体到中国的农村流动人口而言,首先,尽管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产生了乡村凋敝现象,但故乡是大多数人完成初始社会化的地理坐标,对故乡的眷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其次,农村流动人口仅在经济体系上被城市接纳,在社会与文化体系上仍然受到排斥<sup>[13]</sup>,城市社会的全面适应面临较大阻力。因此,并存于城乡社会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构成了农村流动人口生活体验的基本影响因素。

### 1. 故乡眷恋

费孝通先生曾用“乡土本色”概括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乡村囊括了熟人社会长久互动中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谋生成为几千年以来农民最普遍的谋生办法<sup>[14]</sup>。即使是置身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仍携有鲜明的乡土烙印,且在故乡留存具体的利益关系,这与欧美社会移民不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持续推行,确立了农民对耕地的长期使用权,有地可耕的制度建构形成了稳定的心理依赖,不同于欧洲“圈地运动”的历史后果。第二,出于理性考量,家庭成员中的老人和孩子在故乡留守。显然,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以青壮年和精英为主,而欧美社会则以底层居多。第三,农村社会中世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身居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仍具有隐形约束力,乡土情结的产生和发展情形与西方“城邦”文化的历史完全不同。

上述耕地、家庭成员留守、乡土文化认同与欧美社会的人口迁移景象完全不同,形成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故乡眷恋的本土事实。在传统农业社会,耕地几乎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具有农民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的综合功能,还承载了一种农民情结,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不高<sup>[15]</sup>。现代社会,耕地对农村流动人口既是束缚,也是最后的生活保障<sup>[16]</sup>。进一步分析,耕地的束缚体现在农业生产损失了短期获得更高非农收入的机会成本,但非农收入的不确定性随着年龄增加、身体条件变差而提高。加之农民身份转换的现实困难,短期机会成本的损失并不冲抵耕地的长远保障功能带来的满足感,因此耕地对农村流动人口心理的积极影响客观存在。伴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涌现,留守现象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留守经历给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消极体验,留守家庭成员存在更大的身心健康风险,这种消极体验藉由亲子、夫妻关系传递给家庭流动人员。反之,家人随同流动可以显著提高生活满意度<sup>[17]</sup>。对农村流动人口文化适应的研究认为,乡土文化往往无法被城市所包容,乡土文化认同阻碍了城市社会适应过程,由此滋生社会孤立或封闭感<sup>[18]</sup>。但这些结论存在一个较强假定,即将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人口视为同质群体,忽略了他们特殊的生计策略和心理变形的事实。例如,农村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内卷化特征明显<sup>[19]</sup>,而乡土文化提供的身份认同对其城市社会网络的构建非常重要。综上所述,故乡眷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体验有双重作用:耕地的拥有和乡土文化认同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家庭成员留守故乡会降低生活满意度。由此提出故乡眷恋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sub>1</sub>:故乡眷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H<sub>1-1</sub>:拥有耕地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sub>1-2</sub>: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sub>1-3</sub>:家庭成员留守对生活满意度有负向影响。

### 2. 城市适应

农村流动人口的城乡流动不仅体现在空间的转换,也意味着对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这一过

程亦是其城市社会融合的过程。社会融合理论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同化论”、“多元论”和“整合论”三个基本流派<sup>[20]</sup>。国内社会融合研究集中于流动人口群体,提出了一些本土化理论解释,如田凯的“再社会化说”(经济、社会、心理、文化)<sup>[21]</sup>、张文宏等和朱力的“融合递进说”<sup>[22-23]</sup>、杨菊华的“融入互动说”(经济、社会、文化、身份)<sup>[24]</sup>。这些解释涵盖了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维度与层次,借鉴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农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维度。由于户籍制度的屏蔽,身份的融合与转换对于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来说难以实现,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城市适应不包括身份维度,将城市适应分为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四个维度。

已有研究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理论探讨,大致上从社会排斥、社会距离、社会资本、共生理论等视角展开。从城市适应的推进层次来看,经济适应是农村流动人口城市立足的基础,文化适应反映了生活方式与城市居民的趋同,社会适应体现了城市社会参与的广度,心理适应则是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的深层表现。一言以蔽之,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是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依次推进的过程。实证研究发现,农村流动人口城市适应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其城市社会资本的积累,缩小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城市适应水平高的流动人口,持有更积极的心态与良好的生活体验。据此认为,较高的城市适应水平有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其生活满意度与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及心理适应正向相关。由此提出城市适应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sub>2</sub>:城市适应水平与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

H<sub>2-1</sub>:经济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

H<sub>2-2</sub>:文化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

H<sub>2-3</sub>:社会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

H<sub>2-4</sub>:心理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

### 3.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的张力

社会融合理论有“同化论”“多元论”“整合论”三个基本取向。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持返乡的长远心理预期,故不可能完全摒弃乡土性的生活方式,实现与市民的同质化。因此,农村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合过程更偏向“多元论”的理论预设,个体现代性与乡土性的表达体现为不同情境下对文化框架和适应策略的选择。换言之,农村流动人口需面对城乡社会场域中不同生活方式的切换,这种双重文化经验对日常生活体验的影响较为复杂<sup>[25]</sup>。问题在于,指向乡土性的故乡眷恋与指向现代性的城市适应在流动人口自身是否存在矛盾,二者的互动对生活满意度有何种影响?有研究发现,现代性与乡土性在农民工群体存在较大张力,城市现代性适应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乡土认同<sup>[26]</sup>,这一现象实质上反映了与城乡户籍身份对应的诸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利益的差距。也有研究发现,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农村流动人口对原先的乡土文化失去了自信,乡土文化相较城市文化处于劣势地位<sup>[27]</sup>。这意味着,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适应的期待更高,继而削弱故乡眷恋对生活体验的影响,即故乡眷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会受到城市适应水平的约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第三个假设:

H<sub>3</sub>:城市适应水平越高,故乡眷恋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越小。

## 二、数据与变量

###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的“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部分。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在北京、青岛、郑州、嘉兴、中山、厦门、深圳和成都8个城市进行。调查对象为在调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15~59

周岁的流动人口,因此本文中的“农村流动人口”指在城市工作一个月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数据样本总量为 15 999 个,去掉城镇流动人口样本及相关缺失值后,得到 12 783 个分析样本。

## 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活满意度。使用迪纳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对应的题项为:“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的”“迄今为止,我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重要东西”“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再过一次的话,我基本上不会作任何改变”,用 1~7 分依次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上述题目加总后,采用 Diener 等生活满意度量表的赋分法,重新赋值 1~7 分<sup>[28]</sup>得到生活满意度变量。取值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故乡眷恋和城市适应。将故乡眷恋具体操作化为是否有耕地、乡土文化认同、家庭成员留守三个维度,将城市适应分为经济适应、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四个维度。

**耕地:**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在故乡有无耕地与耕地面积,考虑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地区不平衡性,我们选择了在故乡是否有耕地的题项,选项设置为“有”和“无”。

**家庭成员留守:**主要考虑流动人口配偶、父母与子女的留守情况。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是否“在老家有配偶生活孤独的问题”“有老人需要赡养的问题”“有孩子需要照顾的问题”。其中对配偶问题的回答中,有 89.08% 的被访者回答“不适用”,只有 2.48% 的被访者有此顾虑,这说明目前农村人口流动以未婚人口和已婚夫妇双方外出为主。因此使用被访者在老家是否有“老人赡养”和“子女照看”考察家庭成员留守状况,选项设置为“有”和“无”。

**乡土文化认同:**重点关注农村流动人口对故乡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认同程度。问卷中使用一组相同选项(取值 1~5 表示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题项来测量。如表 1 所示,对其进行反向赋值后,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乡土文化认同”公因子,并转换为 0 到 10 的取值, $\alpha$  值为 0.80, KMO 值为 0.74,乡土文化认同公因子的解释度为 62.70%。

表 1 乡土文化认同因子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共量	KMO 值
遵守家乡的风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3.88	0.79	0.82	0.67	0.70
按照家乡的习惯办事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3.68	0.80	0.85	0.73	0.69
我的孩子应该学会说家乡话	3.64	0.87	0.71	0.51	0.81
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3.50	0.83	0.78	0.60	0.80

**经济适应:**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的非农收入<sup>①</sup>。使用被访者的月收入水平进行测量,由于收入水平的调查数据明显右偏,对其进行对数转化。

**文化适应:**指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生活方式的趋同。问卷中使用一组相同选项(取值 1~5 表示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的题项来测量。如表 2 所示,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文化适应”公因子,并转换为 0~10 的取值, $\alpha$  值为 0.86, KMO 值为 0.76,文化适应公因子的解释度 71.15%。

表 2 文化适应因子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共量	KMO 值
卫生习惯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3.61	0.85	0.82	0.67	0.77
衣着打扮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3.71	0.80	0.86	0.73	0.77
教育理念或养老观念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不同	3.53	0.88	0.86	0.74	0.75
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与本地市民存在较大差别	3.56	0.87	0.84	0.71	0.75

① 严格意义上,经济适应也包括住房条件等,但由于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务工的主要动机是获取非农收入,并不注重住房条件等城市生活条件,住房状况并不能真实反映经济适应状况,故没有考察。

社会适应:指农村流动人口城市社会的参与广度。问卷中使用一组相同选项(取值1~4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题项来测量。如表3所示,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社会适应”公因子,并转换为0~10的取值, $\alpha$ 值为0.89, $KMO$ 值为0.81,社会适应公因子的解释度75.34%。

表3 社会适应因子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共量	$KMO$ 值
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3.15	0.70	0.87	0.75	0.81
我觉得我是这个城市的成员	3.20	0.68	0.91	0.83	0.76
我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3.24	0.65	0.90	0.81	0.81
我愿意融入社区/单位,成为其中的一员	3.37	0.59	0.79	0.62	0.87

心理适应:指农村流动人口与市民的心理距离。问卷中使用一组相同选项(取值1~4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题项来测量。如表4所示,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心理适应”公因子,并转换为0~10的取值, $\alpha$ 的值为0.90, $KMO$ 值为0.88,心理适应公因子的解释度72.88%。

表4 心理适应因子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因子载荷	共量	$KMO$ 值
我愿意与本地人共同居住在一个街区(社区)	3.48	0.58	0.87	0.76	0.89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同事	3.51	0.57	0.90	0.82	0.86
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	3.53	0.57	0.90	0.82	0.86
我愿意与本地人交朋友	3.54	0.56	0.88	0.78	0.88
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本地人通婚	3.34	0.66	0.69	0.47	0.95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有两类。第一类是个体特征,包括性别、世代、婚姻状态、教育水平、就业行业、就业身份;第二类是流动特征,包括流动范围、流动时间和流动地区。

文中涉及到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样本统计特征值如表5所示。从统计分析结果上来看,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平均4.43分,标准差1.54分,同一数据中城市户籍人口生活满意度为4.55分,标准差1.57分,显著高于农村流动人口( $t=-3.40, P=0.000$ )。分世代来看,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4.32分)低于第一代(4.6分),两代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t=9.93, P=0.000$ )。

表5 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1~7(非常不满意=1;...非常满意=7)	4.43	1.54
耕地	无=0;有=1	0.90	0.30
老人留守	无=0;有=1	0.69	0.46
孩子留守	无=0;有=1	0.20	0.40
乡土文化认同	0~10	6.71	1.63
经济适应	5.30~12.61	8.53	0.56
文化适应	0~10	6.51	1.79
社会适应	0~10	7.48	1.90
心理适应	0~10	8.30	1.66
性别	女=0;男=1	0.58	0.49
世代	第一代=0;第二代=1	0.61	0.49
婚姻状态	未婚=0;已婚=1	0.72	0.45
教育年限	0~19年	10.01	2.56
流动时间	0.08~33.33年	4.13	4.39
流动范围	省内=0;省外=1	0.53	0.50
<b>就业身份</b>			
雇员	雇员=1	68.01%	—
雇主	雇主=2	7.17%	—
自营劳动者	自营劳动者=3	24.01%	—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其他	其他=4	0.81%	—
<b>就业行业</b>			
制造业	制造业=3	30.51%	—
建筑业	建筑业=5	5.09%	—
批发零售业	批发零售业=6	21.28%	—
住宿餐饮业	住宿餐饮业=8	14.67%	—
居民生活服务业	居民生活服务业=15	15.13%	—
其他	其他=21	13.32%	—
<b>地区</b>			
东部	东部=1	73.10%	—
中部	中部=2	14.13%	—
西部	西部=3	12.77%	—

### 三、模型结果分析

在大样本分析中,定序 Logit 模型和多元线性模型对变量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没有显著影响<sup>[29]</sup>。多元线性模型系数在解释上更加直观,故本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故乡眷恋、城市适应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模型结果见表 6。

表 6 故乡眷恋、城市适应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经济适应					0.282***	0.029
文化适应					0.042***	0.008
社会适应					0.130***	0.009
心理适应					0.007	0.010
耕地			-0.020	0.045	-0.019	0.044
老人留守			-0.220***	0.030	-0.203***	0.029
孩子留守			-0.178***	0.036	-0.112**	0.035
乡土文化认同			0.040***	0.008	0.040***	0.008
性别(ref=女)	-0.071*	0.028	-0.073**	0.028	-0.070*	0.027
世代(ref=第一代)	-0.074*	0.033	-0.085*	0.033	-0.108**	0.032
婚姻状态	0.293***	0.036	0.381***	0.037	0.186***	0.040
教育年限	0.003	0.006	0.006	0.006	-0.008	0.006
<b>就业行业(ref=制造业)</b>						
建筑业	0.197**	0.066	0.184**	0.065	0.165*	0.064
批发零售业	0.109*	0.045	0.098*	0.046	0.104*	0.045
住宿餐饮业	0.021	0.046	0.026	0.046	0.059	0.045
居民服务业	-0.085	0.045	-0.083	0.045	-0.050	0.044
其他	0.041	0.046	0.040	0.046	0.033	0.045
<b>就业身份(ref=雇员)</b>						
雇主	0.432***	0.057	0.407***	0.056	0.250***	0.057
自营劳动者	0.153***	0.039	0.136***	0.039	0.070	0.038
其他	0.122	0.151	0.133	0.151	0.210	0.148
<b>地区(ref=东部)</b>						
中部	-0.113*	0.044	-0.084	0.044	-0.074	0.044
西部	0.138**	0.045	0.155**	0.045	0.078	0.045
省外流动	-0.020	0.031	-0.006	0.031	0.053	0.031
流动时间	0.010**	0.003	0.007*	0.003	-0.000	0.003
常数项	4.148***	0.078	4.002***	0.109	0.582*	0.259
Adj R <sup>2</sup>	0.028		0.036		0.075	

注: \*、\*\*、\*\*\* 分别表示在 5%、1%、0.1%水平上显著,下同。

如表6模型1所示,控制变量中,性别、婚姻、就业行业、就业身份、就业地区和流动时间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男性低于女性,已婚者高于未婚者。从就业行业上来看,以制造业为参照类,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从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从就业身份上来看,雇主与自营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高于雇员。从流入地的地区上看,以东部流动人口为参照类,中部生活满意度较低,西部生活满意度较高。流动时间越长,生活满意度越高。

### 1. 故乡眷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6模型2呈现了故乡眷恋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首先,耕地与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相关性,曾经被视为“命根子”的耕地现或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地位。这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与农民生活关系的变迁,在市场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农民对于耕地的依赖性正在下降。其次,故乡有老人或孩子留守显著降低了生活满意度,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分别比没有家人留守的流动者生活满意度低0.220和0.178。流动人口在老人照顾与孩子养育方面无法亲为,家庭成员不在场的情感剥夺大大降低了生活满意度。再次,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生活满意度提高0.04。难以获得市民身份的情况下,乡土文化恰好成为流动人口城市社会网络构建的媒介,为城市非正式群体提供了确定性身份归属,有效避免滑向“边缘人”。

由此,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_{1-2}$ 和 $H_{1-3}$ 得到了验证, $H_{1-1}$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故乡眷恋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为复杂,耕地的拥有在当前阶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家人留守故乡则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消极影响。

### 2. 城市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6模型3加入了城市适应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第一,经济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相关:月收入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生活满意度增加0.282。收入的提高不仅为流动者的城市生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也实现了家庭经济地位在故乡的提升。第二,文化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相关:文化适应增加一个单位,生活满意度提高0.042。文化适应水平的提高,逐渐实现了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方式与市民的趋同,降低了城市社会排斥的可能。第三,社会适应水平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相关:社会适应每增加一个单位,生活满意度提高0.13。社会适应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农村流动人口城市社会参与的广度和城市的主人公感。第四,心理适应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心理适应反映了农村流动人口与市民的社会心理距离,表征了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和向往,是城市适应的最高层次<sup>[30]</sup>。二者没有显著相关性的可能原因在于:首先,从测量上看,这里的心理适应更多反映农村流动人口对市民的单向认同,城市社会排斥的普遍存在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更大的负向影响;其次,与经济适应、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相比,心理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在短期城乡流动过程中难以体现;再次,出于城市的短期务工打算,农村流动人口的心理适应发生了变形——心理适应仅作为城市适应的权宜之策。

此外,与模型1和2相比,生活满意度的地区差异不再显著,东、中、西部流动人口在故乡眷恋和城市适应上的差异性解释掉了地区间的差异。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设 $H_{2-1}$ 、 $H_{2-2}$ 和 $H_{2-3}$ 得到了验证, $H_{2-4}$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文化适应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均有积极影响,而心理适应则与生活满意度不显著相关。

### 3. 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的交互作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受故乡眷恋和城市适应双重空间因素的直接影响,但二者间的张力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怎样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进一步检验二者的交互作用。表6分析显示,城市适应中,心理适应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将文化适应与社会适应合并<sup>①</sup>为城市的主观适应变量,将经济适应视为城市的客观适应变量,然后将城市的主客观适应变量与老人留守、孩子留守及乡土文化

① 由于前文中对文化适应、社会适应变量的处理中使用了因子分析法,已经损失了部分原始调查数据信息,所以这里的变量合并使用了直接加总的方法。

认同三个变量(耕地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故略去)进行交互分析。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交互作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见表 7。

表 7 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交互作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客观适应×老人留守	-0.017	0.048				
主观适应×老人留守	-0.005	0.020				
客观适应×孩子留守			-0.120	0.071		
主观适应×孩子留守			0.001	0.023		
客观适应×乡土文化认同					-0.052***	0.014
主观适应×乡土文化认同					-0.009	0.005
客观适应	0.289***	0.042	0.299***	0.031	0.281***	0.029
主观适应	0.184***	0.017	0.180***	0.011	0.182***	0.010
老人留守	-0.202***	0.029	-0.202***	0.029	-0.203***	0.029
孩子留守	-0.115**	0.035	-0.105**	0.036	-0.113**	0.035
乡土文化认同	0.044***	0.008	0.044***	0.008	0.047***	0.008
其他变量			已控制			

注:模型中涉及交互项的连续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 7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显示,城市主客观适应与老人、孩子留守的交互作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适应水平的提高,并不改变家人留守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模型 3 显示,乡土文化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受到城市客观适应的约束:收入越高,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越小,但文化和社会适应的提高并不削弱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设 H<sub>3</sub> 得到部分验证。

总之,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张力,城市务工收入的增长,逐渐削弱了乡土文化认同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这与农村人口流动的经济动机相统一。但城市流动带来的情感剥夺不因城市适应性的提高而得到弥补——留守老人与孩子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独立存在。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应该是一种基于家庭单位的、经济理性和情感需求的综合考量。

####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 2014 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分析了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对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受城乡双重社会空间因素的影响。从现实利益来看,经济差距是农村人口流动的重要推拉力,外出务工成为一种更加快捷的致富方式。从社会心理与文化的层面来看,农村流动人口将乡土文化移空运用于城市社会网络的构建以获得相应社会支持,但也因此强化了社会交往的群体内卷化,且基于经济能力和收入支配逻辑出现的居住空间隔离,形塑了其特殊的生计策略与城市心理适应的虚像,最终难以深层次融入城市社会。其次,农村流动人口长期面临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调试,故乡眷恋与城市适应的内在张力凸显出其主观福祉需求的某种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城市经济收入的提高,削弱了乡土文化在城市空间提供的积极作用,但城乡流动的经济理性行动引致家庭离散化的消极情感后果却无法被现代性的提高而改变。

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依然是一种特别而重要的社会事实。农民的市民化还很困难,平衡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生活体验,对于城乡社会的统筹发展意义深远。一方面在新型城乡关系的构建中,城市现代性中的经济理性对乡土文化存在解构的可能,应充分挖掘乡土文化在城乡社会整合中的积极功能。另一方面着力解决好随迁家庭成员的教育与养老问题,破解家庭离散化困局是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9:2.
- [2] KNIGHT J, GUNATILAKA R.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 113-124.
- [3]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 2003(1): 125-136, 207.
- [4] 白南生, 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08(4): 2-10, 95.
- [5] 曾迪洋, 洪岩壁.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迁移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49-60, 153-154.
- [6] 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人口研究, 2011(5): 8-25.
- [7] 俞林伟, 朱宇.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及其代际差异——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 2017(10): 74-84, 157.
- [8] 杨建科, 王琦.经济发展、社会融合与西部居民幸福感——基于多民族的视角[J].民族研究, 2018(5): 1-13.
- [9] 汪华, 孙中伟.乡土性、现代性与群体互动:农民工老乡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山东社会科学, 2015(2): 21-27.
- [10] 李培林, 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问题[J].社会, 2012(5): 1-24.
- [11] 黄嘉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122-133.
- [12] 祝仲坤, 陶建平, 冷晨昕.迁移与幸福[J].南方经济, 2019(3): 90-110.
- [13]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6(5): 107-122, 244.
- [1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
- [15] 陈占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3(1): 55-62.
- [16] 李涛, 柏昱.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的困局与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 2017(6): 104-109.
- [17] 王琼, 何哲飞.不同流动形式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差异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70-76.
- [18] 褚荣伟, 肖志国, 张晓冬.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12(1): 44-51, 124.
- [19] 潘泽泉, 林婷婷.劳动时间、社会交往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5(3): 108-115, 128.
- [20] 丁宇, 姜丹.社会融合的理论类型和政策实践原则[J].学习与实践, 2019(3): 73-83.
- [21] 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 1995(5): 90-95.
- [22] 张文宏,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 2008(5): 117-141, 244-245.
- [23]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 2002(6): 82-88, 206.
- [24]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61-79, 203-204.
- [25] 李强, 李凌.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视角——文化适应的视角[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129-139.
- [26] 张桂金, 刘小敏.乡城移民的乡土文化认同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分析[J].南方经济, 2018(11): 121-136.
- [27] 田丽, 邹丽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问题——基于乡土文化的视角[J].学习论坛, 2016(4): 56-60.
- [28] DIENER E, PAVOT W.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the emerging construct of life satisfaction[J].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8, 3(2): 137-152.
- [29] FERRER-I-CARBONELL A, FRIJTERS P.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J]. Economic journal, 2004, 114(497): 641-659.
- [30] 胡维芳.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研究现状及其对社区教育的启示[J].青海社会科学, 2018(4): 130-134.

(责任编辑:金会平)